

日本考古學與民族主義： 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意識型態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二〇〇〇年是日本考古學的不祥年。日本前期及中期舊石器遺跡被揭發是由業餘考古學者藤村新一所捏造，整個日本前期及中期舊石器的考古成果被澈底推翻。藤村成眾矢之的，個人承擔所有責任。文化廳官僚、地方政府、傳媒及學界紛紛以受害人身分批判藤村。究竟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是否單純是藤村新一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欺詐行為？

本文探討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來龍去脈及背後的意識型態，從而顯示這是二十多年間多方面與藤村共謀下的產品，在背後推動及利用其考古發現的學者、傳媒、文化廳官僚及地方政府難以逃避責任。事件的出現與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興起的新民族主義息息相關，考古學成為推動民族主義的棋子。官方利用教科書、博物館、指定文化古跡等手段宣傳偽考古發現，去提倡「日本古代文明大國論」及「日本人論」。地方政府亦希望藉此加強地區凝聚力及旅遊資源。傳媒及學界不但把關乏力，甚至煽風點火，與官方一起大合唱。

關鍵詞：日本考古學、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型態、學術欺詐

壹、前言

二〇〇〇年是日本考古學的不祥年，長達二十多年的「日本舊石器時代偽造史跡運動」被揭發，日本石器時代的考古認識從六十萬年前退回三萬年前。¹ 換言之，整個前期（十三萬年前以上）及中期（十三萬至三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考古成果被澈底推翻，考古發現只支持日本有後期舊石器時代而已。捏造事件的主角藤村新一自認是一人所為，而一直給藤村經費、鼓掌或宣傳的學者、傳媒、文化廳官僚及地方政府均大義凜然，紛紛以受害人身分，與藤村劃清界線。究竟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是否單純是藤村新一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欺詐行為？本文探討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的來龍去脈及背後的意識型態，從而顯示這是二十多年間多方面與藤村共謀下的產品，藤村不過是一名馬前卒而已，在背後推動及利用其考古發現的學者、傳媒、文化廳官僚及地方政府難以逃避責任。事件的出現與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興起的新民族主義息息相關，考古學成為推動民族主義的棋子。在缺乏嚴謹的檢證下，一些可疑的考古發現被官方利用，透過教科書、博物館、指定文化古跡等手段，去提倡「日本古代文明大國論」及「日本人論」。地方政府亦希望藉此加強地區凝聚力及旅遊資源。傳媒及學界不但把關乏力，甚至煽風點火，與官方一起大合唱。

貳、日本被塑造成古代文明大國的軌跡

考古學的發展與各地政權的意識型態息息相關。考古學作為

¹ 有關此事的來龍去脈，參 David Cyranoski, Fake Finds Reveal Critical Deficiency, *Nature* 408 (16 November 2000), pp. 280-281.

一門學科，自成立以來，一直容易被政治左右，用來鼓吹民族主義及合理化海外擴張。不論戰前的大英帝國及納粹德國，戰後的中日韓、蘇聯及中東，考古學均被官方利用來宣揚其官方意識型態。² 最著名的是「皮爾當人」（Piltdown Man）事件。一九一二年英國發現宣稱是猿人遺骨的皮爾當人，直至一九五三年被揭發為騙局為止，它一直被用作宣揚英國為人類發源地之一，為英國的白人優越論及大英帝國的權威提供偽學術支持。³

日本的考古學自明治時期（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受官方意識型態影響。⁴ 明治的考古學者在日本各地發現繩文時代（公元前一四〇〇〇至四〇〇年）遺跡，不過因為要強調「萬世一系」及「天孫降臨」的天皇崇拜，學者不能自由討論日本人的來源，只能對出土文物做分類及年份鑑定，儘量避免作政治及歷史上的詮釋。⁵ 當然將考古學用作弘揚民族精神則不成問題，例如東京大學講師鳥居龍藏（一八七〇至一九五三年）在其八百多頁的《有史以前の日本》（東京：磯部甲陽堂，1918）中，挑戰日本石器時代是蝦夷人所建的固有見解，認為早在日本石器時代，大和民族及蝦夷族已經並存。此書因肯定日本民族及文化的一脈相

² Philip Kohl and Clare Fawcett, (Eds.),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提供十多個世界各地的個案研究，顯示考古學如何為政治服務。

³ Joseph 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⁴ 有關明治時代官方如何利用考古學去宣揚單一民族神話，參小熊英二，《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的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1998）。

⁵ Clare Fawcett, *Nationalism and Postwar Japanes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2-233. 此論文主要探討戰前及戰後初期日本考古學的發展與政治的關係，較少論及前期舊石器的問題。

承，配合官方意識型態而備受推崇，戰前一共重版九次。⁶ 相反，若有學者敢言大和民族並非繩文人後裔及在繩文及彌生時代（公元前四〇〇至二五〇年）的日本根本沒有國家及天皇，結果只會自招麻煩。到了在軍國主義興起的年代，對任何可以挑戰皇室萬世一系及皇權神授的討論都是禁區。歷史考古學者喜田貞吉（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九年）在其編撰的小學歷史教科書中將南北朝（一三三六至一三九二年）並列，有違官方的南朝正統論，結果失掉東京大學的教席。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至一九六一年）因質疑《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創世神話而失掉早稻田大學的教席及其相關著作被禁，連出版商岩波書店的代表岩波茂雄（一八八一至一九四六年）也受累被捕。

戰前歷史教科書將創世神話當作歷史事實般看待，宣傳天皇始祖是天孫降臨的神國皇國思想。史跡的功能是推動皇民思想，例如一本給教員參考的教科書指導要領《鄉土的觀察》（1943）明言史跡的存在是「令國民對國體尊嚴及鄉土光榮心存感激，令他們真實地感受皇國臣民的身分。」⁷ 戰前大部分國定史跡都是與明治天皇有關的「聖跡」。

直至一九四〇年代為止，日本的考古學界認為人類在日本列島的歷史只有一萬年左右，當時考古發掘最古只上推至繩文時代，沒有發現任何舊石器時代的遺跡。戰後考古學者獲較大的學術自由，不用再顧忌神道神話，可以透過考古學去重建日本史前史。⁸ 一九四三年在靜岡縣登呂發現彌生時期的登呂遺跡，因戰時狀態

⁶ 齋藤忠，《日本考古学史の展開》（東京：學生社，1990），頁 247-252。

⁷ 森本和男，《遺跡と発掘の社会史》（東京：彩流社，2001），頁 22-23。

⁸ 雖然宮內省戰後仍以有損皇室尊嚴為理由，限制皇陵的考古發掘，令學界無法深入考證天皇家族的來源，引起石部正志及江上波夫等學者的不滿。

及內容敏感而沒有被認真調查。登呂遺跡的發掘成戰後日本考古學的起點，在一九四七年開始展開大規模發掘，發現水田、倉庫及房屋的遺跡。該遺跡在一九五二年成「國家特別史跡」。登呂遺跡的研究顯示彌生文化（包括水稻及金屬器具）很可能受中國大陸的影響。⁹

戰後初期在關東地區為主發現一些後期舊石器時代（三萬至一萬年前）的遺跡，其中以民間業餘考古愛好者相澤忠洋（一九二六至一九八九年）在一九四九年群馬縣赤城山發現的岩宿遺跡（約二萬五千年前）最有名，但一直沒有任何超過三萬年前的發現，所以當時學界一般認為日本是沒有前期及中期舊石器時代。¹⁰ 當時的歷史教科書如此記述：「日本歷史始於約三萬年前，約一二〇〇〇年前為止稱後期舊石器時代，從一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〇年前為繩文時代。」¹¹

自一九八一年起，民間考古學者藤村新一（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前副理事長）藉着捏造石器及遺跡，竄改了日本舊石器的歷史及使日本考古學迷走二十多年。自從一九八一年在宮城縣座散亂木遺跡「發現」四萬八千年前的中期舊石器以來，直至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被揭發捏造為止，藤村是日本最享負盛名的石器發掘專家。從一九八一年至二〇〇〇年間，藤村在日本各地掘出四十二個舊石

⁹ Mark Hudson, *Ruins of Identity: Ethnogenesis in the Japanese Islan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47-49.

¹⁰ 相澤忠洋的發現被芹澤長介所承認。芹澤相信日本有舊石器時代，他分別在一九六四年在大分縣早水台及一九六五年在關東星野宣稱發現比岩宿遺跡更古老的石器，但其說法不為學界所接受。

¹¹ 轉引自立花隆，《「旧石器発掘ねつ造」事件を追う》（東京：朝日新聞社，2001），頁7。

器時代遺跡，而且年份不斷往前推。從三十萬年前的馬場壇 C 遺跡，到五十萬年前的高森遺跡，最後至七十萬年前的上高森遺跡。其發現很多都宣稱是世界紀錄，例如上高森遺跡的石器埋納遺構及小鹿坂遺跡的柱穴是「全球僅有」，而長尾根遺跡的墓跡則為「世界最古」，令全國數年間沉醉在日本成為世界級的文明古國的浪漫情懷。幾乎所有前期舊石器遺跡都是由藤村一手「發現」。如此長期及大規模的捏造，在世界考古學史可謂絕無僅有。

藤村的假石器及遺跡令很多日人相信日本列島在數十萬年前已有原人活動，掀起「日本原人論」的偽學說。「日本原人論」建基於藤村新一的假石器，日本並沒有發現原人（二十萬年前及更古）遺骨，連「舊人」（二十萬至十萬年前）遺骨也沒有。這點跟非洲及中國的原人考古出土不同。¹² 只有大量石器而沒有人骨出土其實非常可疑，但在日本卻鮮有被質疑。¹³ 在日本列島出土的最古人骨是沖繩縣山下町洞穴人，屬於三萬五千年的「新人」。長谷部言人（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九年）宣稱一九三一年在兵庫縣明石市出土的人骨是與北京原人同期的「明石原人」，但不為學界接受，估計是繩文時代之後的人骨。一九五〇年栃木縣出土的「葛生原人」最初估計是五十萬年前的原人遺骨，後來被鑑定是十五世紀室町時代（一三三八至一五七三年）人骨。一九六二年在分縣出土的「聖嶽人」，最初估計是二萬年前人骨，後來被鑑定是江戶時代（一六〇三至一九六八年）的人骨。¹⁴

¹² 非洲及中國兩地均發現原人石器及遺骨。此外，東南亞（例如約八十萬年前的印尼「瓜哇原人」）及歐洲（意大利、德國）也發現原人遺跡。

¹³ 慶應大學教授阿部祥曾表示非洲及歐洲等石器與人骨一起出土，有助年代鑑定。日本只出舊石器，只能靠出土地層鑑定。

¹⁴ 「聖嶽人」曾記載在二十三套高校日本史教科書。當它被鑑定為非石器時

原人主要在非洲及中國出土。中國近年發掘出近二〇〇萬年前遺跡（具爭議性），因此傳統的非洲起源論（東非發現一八〇萬年前遺跡及人骨化石）被部分學者質疑，有人提出中國亦是另一人類源頭的說法。一九二九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約五十萬年前的原人遺骨，估計已懂生火熟食。一九八〇年代雲南縣元謀市發現一七〇萬年前原人遺骨（有學者認為只有六〇萬年），估計已懂生火及製造工具，是中國最古的原人遺骨。¹⁵

「日本原人論」支持亞洲為非洲以外，另一原人發源地。「日本原人論」給學者及作家無限想像空間。高土與市（1993）的《日本原人がやってきた》（日本原人來臨）想像二十萬年前原人從北京遷移至九州的情景。¹⁶ 中國考古學學者黃慰文曾訪上高森遺跡，表示贊同藤村的考古發現，又認為「中日研究的進展如車之兩輪。不久非洲原人擴散說的年代變更勢必發生。」¹⁷ 「日本原人論」的興起令日本搖身一變，成為古代文明大國。以前考古及歷史學者證明日本民族及文化與朝鮮半島關係密切，「日本原人論」將日本置於朝鮮之上，因為朝鮮半島沒有原人遺跡，最古的全谷里遺跡只有約十萬年前，「日本原人論」增加日本文化的獨立性。¹⁸ 歐洲及中東只發現二十萬年前的遺跡。「日本原人論」提出日本擁有可能是

代人骨後，發現者別府大學教授賀川光夫自殺，以抗議週刊誌質疑他捏造。

¹⁵ 一九九七年中國啟動尋找二〇〇萬年以上的遺骨工程，但收穫甚微。一九九九年有人宣稱在河北蔚縣找到三〇〇萬年前的石器，但不為學界接受。

¹⁶ 高土與市，《日本原人がやってきた》（東京：國土社，1993）。

¹⁷ 轉引自太田浩，《捏造遺跡：その真相と原人の実体》（東京：Koala Books，2002），頁164。黃慰文是研究北京原人的專家。

¹⁸ 二〇〇七年由同志社大學教授松藤和人領導的日韓共同研究小組在朝鮮半島的萬水里遺跡發現宣稱五十五萬年前的石器，但仍未被學界廣泛接受。

全球最高水平、最具美感的原人文明。以藤村假石器為基礎的「日本原人論」顛覆至今學界對原人的認識。不過這派學者只在日本國內大肆宣揚，並無在海外作學術發表，因此在國際的考古學界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參、中央政府的角色

為什麼像藤村新一的民間考古愛好者成為戰後日本考古發掘的主力？這與政府的政策關係甚大。一九五〇年日本政府成立《文化財保護法》，對遺跡的發掘調查給與官方保護與支持。若在工程時發現古跡，必須暫停以方便調查，在一般情況下，調查完成後古跡會被破壞，工程可以繼續進行，只有極少具國家級歷史價值的古跡會獲得保存。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考古發掘活動不斷增加，現在日本每年約四萬件。因需求很大，發掘人才不足，對調查員的資歷沒有嚴謹要求，大學教授及民間學者均可參與。據稱全國從事遺跡發掘的調查員多達七千名，這大概是全球最大的發掘隊伍，主力是民間愛好者而非大學考古隊伍。¹⁹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中央政府透過政策及資金，加強對考古的影響。大部分遺跡發掘都是獲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援助，考古成果被利用來鼓吹「日本文化論」或「日本人論」，以加強大和民族的認同。最佳例子是將明日香村打造成國家歷史公園及「日本國民心中的家鄉」去振興國民精神。首相、內閣大臣、國會議員及各省廳官僚相繼訪問以示支持。首相佐藤榮作（一九〇一至一九七五年）訪問後表示，飛鳥是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後最初的首都，其文化遺產可向後世傳達大和民族的精神。由內閣決定從中央政府撥巨款建設

¹⁹ 每日新聞舊石器遺跡取材班，《発掘捏造》（東京：每日新聞社，2001），頁200-201。

「國營飛鳥歷史公園」。一九八〇年國會通過《明日香村特別措置法》。本來法案的第一條列明保存飛鳥遺跡目的是「涵養愛國心」，最終在國會討論後被刪掉，但自民黨將史跡作為民族主義的手段可見一斑。²⁰ 學者及作家撰文歌頌飛鳥文化反映日人的獨特美學。

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成為經濟大國，「日本人論」獲得更大的市場。不單是飛鳥文化，繩文研究及石器研究也被利用來鼓吹民族主義。繩文時代被指已進入史前世界鮮有「高度文明都市化」、擁有逾萬年超穩定社會發展及其陶器是全球最古。²¹ 吹噓得最厲害的是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在藤村的魔笛下，日本舊石器研究開始「暴走」，為奠定日本作為古代文明大國提供學術「佐證」。

中央政府文化廳調查官岡村道雄與藤村關係密切。他是主張日本有前期舊石器的東北大學名譽教授芹澤長介的門生，早年有參與座散亂木遺跡的調查。岡村在著作中不斷引用藤村的「成果」，例如在其所著（2000）的《日本の歴史 01 縄文の生活誌》一書中，一再強調座散亂木遺跡及上高森遺跡是在日本考古學上的重大突破。²² 他更表示「上高森原人」有意識地將石器排列，不但顯示方向感及規律，連顏色也配合，可見日本遠古原人有高度精神性。他認為遺跡既是祭祀遺跡，也是生活智慧的表示，一反原人野蠻粗鄙的固有形象，是全球原人研究前所未有的新發現。岡村指出「秩父原人」享有高生活水準及維持萬年的和平生活，將前期舊石器時代描繪成遠古的理想鄉。²³ 他又認為藤村有看穿泥土的超能力，所

²⁰ 森本和男，《遺跡と発掘の社会史》，頁 88。

²¹ 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

²² 岡村道雄，《日本の歴史 01 縄文の生活誌》（東京：講談社，2000）。

²³ 此外，岡村在同書中歌頌繩文時代為日本文化的原點，認為透過繩文時代，現代日本人可重建民族認同及自信。

以能不斷找出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及遺跡。在岡村的推動下，座散亂木遺跡於一九九七年被列為「國史跡」，也是中期舊石器唯一國史跡（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被取消，是日本首次因捏造而被取消的國史跡）。雖然座散亂木遺跡有出報告書，但數量甚少，而且只給少數相關人士，連國會圖書館也沒有收藏，學者無法取得報告書加以驗證。藤村直接參與的三十三個遺跡曾被登記為「埋藏文化財」（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均被取消）。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長佐原真撰文歌頌藤村的成就，他亦支持岡村道雄將座散亂木遺跡列為國史跡。佐原（1987）在《大系日本の歴史1日本人の誕生》一書中，指出馬場壇A遺跡的石器有古代毛象脂肪酸，所以絕對可信。²⁴ 他（1999）在《美術館へ行こう・大昔の美しい思う》（去美術館吧，發思古之幽情）想像太古日本原人的生活，²⁵ 表示「六〇萬年前的高森原人擁有與我們共通的美意識。被美感動的心有悠久的歷史」。²⁶ 其實日本並沒有原人遺骨出土，所以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舊石器時代在日本生活的人是現今日人的祖先。佐原的聯想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此外，佐原又介紹鎌田俊昭將假石器的排列解作是象徵男女交合的看法。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佐佐木高明（1991）在《日本の歴史1日本史誕生》一書介紹藤村發掘的前期舊石器遺跡，內容主要參考岡村的見解。²⁷

²⁴ 佐原真，《大系日本の歴史1日本人の誕生》（東京：小學館，1987），頁14-16、57。

²⁵ 佐原真，《美術館へ行こう・大昔の美しい思う》（東京：新潮社，1999）。

²⁶ 轉引自奧野正男，《神々の汚れた手》（福岡市：梓書院，2004），頁135。

²⁷ 佐佐木高明，《日本の歴史1日本史誕生》（東京：集英社，1991）。

以上三書分別由講談社、小學館及集英社出版。這日本三大出版社的歷史系列竟異口同聲宣傳捏造遺跡，而且分別由文化廳、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及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學者執筆，將捏造遺跡包裝成學界共識。連流行文化也為捏造遺跡造勢，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教授春成秀爾（1998）在《マンガ日本の歴史 45 旧石器人の登場》用漫畫向兒童介紹高森遺跡。²⁸

文部科學省一反常態，在沒有嚴謹的學術檢定下，倉促及輕率地通過將藤村捏造的前期舊石器遺跡編進教科書。二〇〇〇年以前，大部分高中歷史教科書都有記載與藤村有關的遺跡。根據文化廳的指引，發掘完成後半年內要出報告書，但是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經手的遺跡，大部分都沒有出版報告書，包括上高森遺跡也沒有相關報告書，但卻不合常規獲文部科學省通過，大部分日本高校日本史教科書以上高森遺跡為「日本最古」人類活動的遺跡加以記載。在捏造事件前，高校日本史教科書二十六冊中有十四冊記載上高森遺跡，並表示是五〇至六〇萬年前遺跡。²⁹ 也有不少記載座散亂木及馬場壇 A 遺跡與日本原人。由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1999）撰寫的《国民の歴史》歌頌日本擁有前期舊石器文化與超穩定及獨特優秀的繩文文化，³⁰ 將日本古代文化與四大文明古國看齊。³¹ 該書執筆者中竟有文部省文化廳官員及日本國立歷史

²⁸ 春成秀爾，《マンガ日本の歴史 45 旧石器人の登場》（石之森章太郎作畫）（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²⁹ 森本和男，《遺跡と発掘の社会史》，頁 211。

³⁰ 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国民の歴史》（東京：産経新聞社，1999）。

³¹ 蘇智良，《日本歷史教科書風波的真相》（北京：人民，2001），頁 69-70。

民俗博物館考古學教授。³²《国民の歴史》對日本石器時代有如下的記述：

從發現日本列島原人遺留的石器群，不能肯定這些原人是否為日本人的祖先，正如不能肯定北京原人是否為中國人的祖先。……遠古的數據難以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意識相連。不論原人是否在日本列島留下足跡，與我們正直的人生觀無關。與日本歷史相關的時代，以後期舊石器的繩文時代為開始。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揭發後，日本高校日本史教科書相繼刪掉相關記述。所有教科書在二〇〇二年版均刪去與藤村有關的遺跡，也不再提日本原人。不少人指摘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檢定不公平，對褒日本的東西（如前期石器時代）鬆，對貶日本的東西（如戰時罪行）嚴。該省教科書課長大槻達也還狡辯曰：「不出報告書，未經學術驗證的東西，真的完全不能記述嗎？被大肆報導，人人知悉的東西也不能記述嗎？我對有人將它與南京事件等東西混為一談感到困惑。」³³其實歷史教科書有關史前史的記述，因涉過時及錯誤而要修訂的例子絕非罕有，例如有教科書記載「明石原人」及繩文與彌生土器的差異等要在改版時刪掉。³⁴日本教科書的可信性受到衝擊。

由右翼作家撰寫的《新しい歴史教科書》雖然不再提上高森遺跡，但強調日本是古代文明大國的主調不變。它在首章如此記述日

³² 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頁140。

³³ 轉引自每日新聞舊石器遺跡取材班，《発掘捏造》，頁166。

³⁴ 每日新聞舊石器遺跡取材班，《発掘捏造》，頁167-168。

本石器時代：

以往認為日本列島沒有舊石器時代遺跡，但是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群馬縣岩宿遺跡發現的石器被確認為舊石器。此後，日本各地相繼發現舊石器，可見日本列島自舊石器時代已有人的活動。³⁵

此文所謂舊石器時代其實只是晚期，但卻沒有清楚說明，多少有誤導成分。它又將繩文文明與世界四大文明比較，指出日本繩文時代擁有逾萬年的平穩社會及人類歷史上最古的土器。³⁶

假石器在國立博物館展覽及假遺址被指定為國史跡。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上野）公展上高森遺跡的石器，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〇〇〇年二月是特別展，從二〇〇〇年三月起改為常設展，直至捏造事件揭發後才被取消。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千葉縣佐倉市）展示上高森遺跡石器的複製品。江戶東京博物館在「新發見考古速報展」中展示小鹿坂遺跡的石器。文化廳的《新發見考古速報》多番肯定藤村經手的「遺跡」，而且同廳還辦石器全國巡迴展。每年舉辦「被發掘日本列島」的文化宣傳活動，將包括上高森遺跡的假石器在各地博物館展覽。

由上述資料可見，中央政府積極參與「造史運動」，並透過教科書、博物館、法例及資金去將考古學納入官方意識型態的架構。考古發現成為支持國民教育、日本人論及日本古代文化大國論的材料。

³⁵ 西尾幹二等，《新しい歴史教科書》市販本（東京：扶桑社，2001），頁21。

³⁶ 西尾幹二等，《新しい歴史教科書》市販本，頁24。

肆、地方政府的角色

地方政府出資支持考古發掘，希望可以掘出遠古遺跡，以促進旅遊業及鄉土認同感。各地都希望成為另一個明日香村或吉野里遺跡。一九七二年奈良縣明日香村發現高松塚古墳，被譽為「世紀大發現」，政府成立「飛鳥歷史公園」，全盛期每年觀光客約一八〇萬，現正計畫向聯合國申請為「世界遺產」。一九八六年在佐賀縣吉野里發現彌生時代的古墓及建築遺址，政府成立「吉野里歷史公園」，全盛期每年觀光客近四〇〇萬。有重要古跡出土，無名之地馬上街知巷聞，鄉民頓覺臉上貼金，對家鄉產生強烈自豪感，因此地方政府樂於消費考古遺跡所帶來的古代文明大國論。

根據一九七五年修訂的《文化財保護法》，除了中央政府可將史跡指定為「國家文化財」外，地方政府亦可自行將史跡編為文化財加以發掘及保存，及建歷史博物館將出土文物展覽。隨著日本經濟高速成長，地方鄉村人口減少。一九八八年中央政府實施「鄉里創生事業」計畫，用國庫支援地方推廣地域歷史及文化的事業，目的是以觀光消費活化地域經濟。不少地方以「鄉里創生事業」名目整備史跡，希望吸引國內旅客、活化地方經濟，促進就業及強化鄉土意識。

藤村新一是宮城縣民間團體「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長，其考古活動亦以宮城縣為多。他接二連三的考古「大發現」，使偏僻落後的東北地區成為日本列島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縣民沉醉於偽造遺跡帶來的太古浪漫情懷。一九九三年藤村在宮城縣縣廳召開記者會，宣佈高森遺跡是「日本最古」的五〇萬年前遺跡，與中國北京原人同期，宮城縣知事本間俊太郎在會中稱「這是改寫日本歷史的大發現」。高森遺跡的發掘工程最初由「石器文化談話會」

負責，中途由宮城縣教育委員會接手，而且該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高調舉辦發佈會，實有邀功之嫌。

一九九四年藤村在附近「發現」六〇萬年前的上高森遺跡，二〇〇〇年在上高森遺跡「發現」日本最古的建築遺址。宮城縣利用此驚世發現大搞旅遊業。遺跡所在的築館町被冠以「原人之里」，町的觀光地圖稱它為「日本人發祥之地」。每年十一月的「藥師祭」加入原人拔河及原人假裝大賽；築館町的馬拉松大賽改稱「築館原人馬拉松」。縣政府修建通往遺跡的道路，商店推出「清酒高森原人」、「原人拉麵」、「原人麵包」、「原人燒餅」及「原人饅頭」等原人商品。二〇〇一年日本國民體育大會在宮城縣舉行，雖然捏造事件令人質疑上高森遺跡的可信性，但縣民最初認為只有一部分是捏造，他們仍以「原人為榮」，結果上高森遺跡成為國民體育大會的採火地。其後當藤村承認所有高森遺跡及上高森遺跡都是捏造後，原人旅遊正式劃上句號及原人系列的商品基本上消失。只有「清酒高森原人」，加上「幻的清酒高森原人」繼續販賣。

高森遺跡及上高森遺跡在一九九〇年代及千禧年掀起日本全國的「原人熱」。除宮城縣外，埼玉縣、北海道、鹿兒島縣、福島縣、山形縣及岩手縣等地方政府均邀請藤村負責當地石器遺跡調查，結果藤村沒有令它們失望，分別在各地發掘出前期舊石器遺跡，在埼玉縣及北海道甚至發現可以改寫原人歷史的遺跡，舉國震動及亢奮。擁有原人遺跡的地方政府在市的網站及觀光小冊迅速加入石器遺跡的介紹。東北地區的資料館及博物館（如東北歷史資料館）紛紛展示偽石器。

一九九六年六月藤村在埼玉縣秩父市的長尾根遺跡「發現」三十五萬年前的石器。二〇〇二年二月他在同市的小鹿板遺跡「發現」五〇萬年前的石器及建築物的柱穴，宣稱是全球首次發現的原

人建築遺跡，也顯示秩父原人過著半定居的生活。七月在長尾根遺跡「發現」世上最古的墓址。埼玉縣縣民及秩父市市長歡呼喝彩，市政府召開「秩父原人祭」及「石器論壇」。西武秩父驛周邊的店舖掛出「秩父原人之里」旗幟，放置原人吉祥物，商人火速推出「原人定食」、「原人饅頭」、「原人燒餅」及「古代秩父原人酒」等商品。埼玉縣知事土屋義彥給與藤村獎狀以表揚其對縣的貢獻，認為秩父原人文化是「埼玉發送給全世界的東西」。秩父市市長內田全一謂「這是夢想與浪漫的發現，有助振興秩父。」³⁷ 埼玉縣教育委員會宣佈，若石器是陪葬品，長尾根遺跡很可能是人類最早的墓地遺跡。二〇〇〇年六月藤村在北海道清水町下美蔓西遺跡「出土」五十萬年前石器，被稱「亞洲最北原人遺跡」。下美蔓西遺跡馬上放置廣告招牌以招遊客。不過還未推廣北海道原人旅遊前，同年十一月藤村已被揭發捏造。

相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捏造事件上以經濟掛帥，雖然也涉及鞏固縣民對地方的歸屬感，似乎背後並無沉重的意識型態。為了使所屬地方成為原人故鄉及史前文化發祥地，地方政府僱用藤村以求「科學佐證」，藤村其實只是買賣偽考古證明的江湖術士，地方政府才是「A貨遺跡」的買家。

伍、學界與傳媒的角色

藤村新一是民間考古愛好者，他只有高中學歷，沒有受過正統的考古學訓練，但卻成日本考古學界名人。他早年在電器公司工作，工餘踏自行車去尋找石器。他於一九七五年加入「石器文化座談會」，拜以堅信前期舊石器時代存在的芹澤長介為師。

³⁷ 每日新聞舊石器遺跡取材班，《発掘捏造》，頁96。

自一九八一年發現座散亂木遺跡而聞名，他分別在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五年獲「相澤忠洋獎」。其事業的高峰是「發現」上高森遺跡。全國絕大部分的前期及中期舊石器都是由他發現。他被稱為「神之手」、「石器發掘之神」及「探索石器之名人」，不少人甚至相信有輕微弱視的他擁有看穿泥土的超能力。嚴格來說，藤村只是從事發掘的人員，不是考古學家，他不撰寫論文及報告書。

雖然藤村所屬的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於一九九二年成立註冊的 NGO 組織，成員連正副所長只有四人，二〇〇四年解散）並沒有對上高森遺跡出版研究報告，令學界無法驗證，但不少學者卻輕率地加以利用。估計二十多年間，逾百名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加以引用。³⁸

東北福祉大學的梶原洋教授（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成員，芹澤長介弟子）撰文主張六〇萬年前日本東北是全球文化最先進的地區，因為他估計上高森原人已具有頗高的宗教知性，有死的觀念，而且懂得造墓，甚至很可能已有言語能力及時間觀念，顛覆西方學者認為原人智力低下的傳統看法，是「顛覆人類通史的大發現」。此外，他相信上高森原人是和民族的祖先。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理事長鎌田俊昭認為在六〇萬年前，上高森遺跡是舉行祭祀的聖地。他又指出石器的 T 及 U 形排列分別是男及女的性器象徵。

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的精神領袖東北大學名譽教授芹澤長介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的《朝日新聞》表示，上高森遺跡的石器排列是世界罕見，反映日本原人獨特的審美意識。他在日本考古學協會創立五〇周年記念演講中預言日本早晚會發現一〇〇萬年前的遺跡。

³⁸ 奧野正男，《神々の汚れた手》，頁 164。

附和及接受上述言論的學者多不勝數。桃山學院大學教授尾本惠市於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日的《每日新聞》撰文，稱上高森遺跡的石器排列、小鹿坂遺跡的柱穴均是改寫日本史前考古學的驚人大發現。此外，東京大學（以藤本強為首）、明治大學及東北大學的考古學者均以藤村的捏造遺跡出版研究論文及專書。東北福祉大學及札幌國際大學曾協助藤村發掘。在沒有真正驗證下，全國沉醉在憑空想像的太古浪漫情懷。日本學界的封鎖性也助長藤村捏造遺跡。日本學界重視輩份及人脈，即使學術討論時各人也按身分，發言小心翼翼，缺乏批判精神。當考古學界及人類學界的著名教授相繼引用藤村的發掘成果時，晚輩的學者即使有所疑也難以發言。³⁹

對藤村發現存疑的意見均被日本考古學界抹殺，無法在考古學雜誌刊登，部分在人類學雜誌發表。上智大學考古學教授 Charles Keally 及東京都教育委員會職員小田靜夫於一九八六年在《人類學雜誌》聯名撰文，質疑座散亂木遺跡出土的石器違反考古常理。此文沒有引起任何討論，兩人卻因此在日本考古學界被疏遠。⁴⁰ 小田為了保持官職，不敢多言。共立女子大學兼職講師竹岡俊樹在一九九八年向《舊石器考古學》投稿，文章有懷疑座散亂木遺跡出土石器的可靠性及藤村的超能力，認為部分是繩文時代石器，使用了不是原人能掌握的技術，而且出土石器又不讓人驗證，結果被評審員認為是對藤村的個人中傷，要求刪改相關部分。竹岡曾向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理事長鎌田俊昭申請，要求查看出土石器被拒。其論文在學界沒有回響，向記者轉送也無反應。

³⁹ Charles Keally, "Japanese Scandals: This Time It's Archaeology," 17 November 2000, in Charles Keally's homepage (<http://www.t-net.ne.jp/~keally/Hoax/hoax.html>).

⁴⁰ 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頁 15。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日本各大電視台、報章及周刊等傳媒更爭相報導最新考古學成果。踏入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最古」的歷史發現更成為一個國民的期待。傳媒多在不加驗證的情況下將考古發現誇大報導，好以「世紀大發見」、「日本最古」、「最古級」、「世界最古」及「世界初」等為題吸引注意。例如一九九三年五月《每日新聞》以〈五十萬年前 日本有原人〉為題，用了整頁頭版報導高森遺跡。一經傳媒廣泛報導，公眾便不會質疑其可信性，發現者也名利兼收。多少也是因為這種由傳媒造成的期待，令藤村新一再捏造更古的遺跡。他甚至答應東北大學名譽教授芹澤長介，在其百歲生日時以發現一〇〇萬年前石器及原人遺骨作賀禮，可見其意氣風發。

可見長期以來學界及傳媒不但沒有把關，抗衡帶有官方意識型態的史跡捏造運動，反而成為共犯，加入讚美日本民族悠久、偉大、優美、和平及一脈相承的大合唱。

陸、結語

戰前日本考古學成為政府宣揚民族主義的手段，戰後初期考古學獲得較大自主性，可是自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以來，考古學再度被官方用作宣揚民族主義的手段。⁴¹ 捏造的遺跡及右傾的解讀，透過考古學的學術包裝，經教科書、博物館及傳媒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人類學家馬場悠男稱政府、地方及學界都是前期

⁴¹ 考古學學者佐佐木藤雄批評右翼團體編寫的《国民の歴史》利用不可靠的考古發現企圖恢復戰前的皇國史觀。參佐佐木藤雄，〈自壞する考古学：成長しない集落論〉，《土曜考古》（春日部市：土曜考古學研究會），2001年5月，25號。

舊石器捏造事件的「精神上的共犯」。⁴²

前期舊石器時代研究是一個官方、地方、民間及傳媒積極共同參與，以捏造考古調查為基礎的「史前史造假運動」，藤村只是一顆重要的棋子。可是自捏造事件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揭報後，藤村成眾矢之的，個人承擔所有責任。⁴³ 他被日本考古學協會開除，被關進精神病院，因此可免被查問及起訴。同謀者搖身變成受害者，紛紛與藤村劃清界線，甚至出面指責。古代史及考古學學者奧野正男指出，若此事發生在海外，文部科學大臣及文化廳長官勢必引咎辭職，但在日本卻完全免責。⁴⁴ 經調查後基本上所有與藤村有關的遺跡都是捏造。日本考古學協會在二〇〇三年五月發表調查報告，表示與藤村參與的一六二項遺跡有捏造，其中一五九項遺跡的學術價值被否定。此外，協會表示日本缺乏有前期及中期舊石器時代的可靠證據，現存日本考古學的成果只可上追至三萬年前的後期舊石器時代。

日本前期舊石器捏造事件背後有明顯的意識型態，再次顯示考古學與民族主義的緊密關係。捏造事件嚴重打擊日本考古學、教科書檢定制度、文化財的保護政策、博物館的展示標準及傳媒的客觀性。考古學要保持其客觀及可信性，必須排除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及嚴謹的科學檢定標準，讓考古遺跡去告訴我們遠古的歷史，不要作不負責任的聯想及假設。

⁴² 馬場悠男，〈精神的な共犯關係〉，《文藝春秋》，2002年8月號。

⁴³ 至於如何解釋《每日新聞》從昔日為藤村造勢至後來揭發其造偽，我想主要是商業上的計算。不論為藤村造勢或揭發其造偽都是為了推高銷量。

⁴⁴ 奧野正男，《神々の汚れた手》，頁10-12。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呂玉新（2006）。《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
香港：中文大學。
- 蘇智良（2001）。《日本歷史教科書風波的真相》。北京：人民。

日文書目

- 小熊英二（1998）。《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 毎日新聞舊石器遺跡取材班（2001）。《発掘捏造》。東京：毎日新聞社。
- 岡村道雄（2000）。《日本の歴史01 縄文の生活誌》。東京：講談社。
- 高土與市（1993）。《日本原人がやってきた》。東京：國土社。
- 佐原真（1987）。《大系日本の歴史1 日本人の誕生》。東京：小學館。
- （1999）。《美術館へ行こう・大昔の美しい思う》。東京：新潮社。
- 佐佐木高明（1991）。《日本の歴史1 日本史誕生》。東京：集英社。
- 佐佐木藤雄（2001）。〈自壊する考古学：成長しない集落論〉，《土曜考古》。春日部市：土曜考古學研究會，5月，25號。
- 春成秀爾（1998）。《マンガ日本の歴史45 旧石器人の登場》（石之森章太郎作畫）。東京：中央公論社。
- 新歴史教科書編寫會（1999）。《国民の歴史》。東京：産經新聞社。
- 森本和男（2001）。《遺跡と発掘の社会史》。東京：彩流社。

西尾幹二等（2001）。《新しい歴史教科書》市販本。東京：扶桑社。

太田浩（2002）。《捏造遺跡：その真相と原人の実体》。東京：

Koala Books。

鳥居龍藏（1918）。《有史以前の日本》。東京：磯部甲陽堂。

馬場悠男（2002）。〈精神的な共犯関係〉，《文藝春秋》，8月號。

立花隆（2001）。《「旧石器発掘ねつ造」事件を追う》。東京：

朝日新聞社。

奥野正男（2004）。《神々の汚れた手》。福岡市：梓書院。

齋藤忠（1990）。《日本考古学史の展開》。東京：學生社。

英文書目

Cyranoski, David (2000). Fake Finds Reveal Critical Deficiency, *Nature* 408, pp. 280-281.

Fawcett, Clare (1995). Nationalism and Postwar Japanese Archaeology, In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eds.),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p. 232-2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dson, Mark (1999). *Ruins of Identity: Ethnogenesis in the Japanese Island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ohl, Philip & Clare Fawcett (Eds.), (1995).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Joseph (2003). *The Piltdown Forg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電子資料

Keally, Charles (17 November 2000). Japanese Scandals: This Time It's Archaeology, in Charles Keally's homepage. Website: <http://www.t-net.ne.jp/~keally/Hoax/hoax.html>。點閱日期：2010年7月14日。

Japanese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ism: Ideologies behind the Early Paleolithic Frauds in Japan

Wai-Ming NG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year 2000 was a bad year in Japanese archaeology. The stone artifacts in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sites in Japan were found to be forgeries planted by the amateur archaeologist Fujimura Shinichi. This scandal destroy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in Japan. The disgraced Fujimura took all the blame and responsibilities. Playing the victim role, government agencies, regional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academia joined the chorus of Fujimura bash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deologies behind the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frauds in Japan, showing that it was indeed a conspiracy involving government agencies, regional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academia. Fujimura's problematic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were used by the officials,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to pursue their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agenda. Through textbooks, museums and designated cultural assets, the offici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sed Fujimura's findings to enhance national pride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Regional governments strove to promote local identity and tourism. The academia and media added fuel to the fire by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Fujimura's findings.

Keywords: Japanes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academic fraud.